

渔浦书院:英才辈出的“新人物”群体

走读湖湘书院



罗长江

乡村七月,绿肥红瘦,万物生长得纵情恣肆。阡陌间的渔浦书院,院墙之外皆是田园风光。

背倚院墙面向平野,一畦畦禾苗葱茏,不时有白鹭、苍鹭起起落落如同即兴的抛物线或五线谱;近处的一汪池塘,塘坑上搭着一大圈瓜棚豆架,藤蔓瓜豆蒙络摇曳,论格局和造型,庶几联想起福建的围屋土楼;黄牛在青草地悠闲食草,水牛躺在泥沼里悠闲洗澡;挨近院墙的花椒树结满了花椒,柚子树摆起了柚子阵,鸡儿刨食、狗儿狎玩,写着鸡犬相闻、怡然自乐的小品;书院右侧的远处是一片葱郁的树林子,为白鹭、苍鹭们起起落落提供了理想的景深;高速公路从树林子一侧呼啸而过,贴着书院背后的太华山麓地向远方;茹溪穿过田野,注入近在咫尺的澧水,奔大江大海而去;隔境相望,即将竣工的“清华大学乡村振兴慈利工作站”主楼和毗连的民居群落,以及视野所及之村野风物,一并演绎着“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乡土场景。

渔浦书院,乡间的书院。



社会实践的大学生与接受“非遗”教育的渔浦小学部分学生合影。清华大学乡村振兴慈利工作站 供图

一

明万历慈利县志载:“环慈皆丛山……民以佃猎渔为生,而无外慕。”地瘠则多劳力,民贫则无恒心,文化闭塞,教育落后,地方苦其久矣。

1883年,乡人李绍华、田金楠等首倡兴建书院,选址今慈利县阳和土家族乡渔浦村的岗前坪。富户竞相解囊捐资财、捐田产,贫寒人家则纷纷献料、投工。工程过半,募资告罄,面临“烂尾”。

富户李长青置酒延客,一席话令与座者莫不动容。他说:“养儿不读书,等于养头猪”,我们这穷乡僻壤,再富也富不过三代,家渐渐就破败了,吃亏在没文化。大伙咬咬牙把书院建成功,造福子孙后代的机会莫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耽搁了。话一说完,慨然出资百万钱。

这位李长青,平日常里每个钢板都攥得出水来。“今日慷慨如斯,人皆谓其所为,尽奋勇而前,争输钱。”读这段文字时,眼前浮现乡间群情激动办书院的动人场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一种对知识改变命运的云霓之望,如同一堆干柴,只需丢一个火种就会熊熊燃烧起来。



砖块上烧铸的“渔浦书院造”字样。



渔浦书院正殿大门。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廖雪红摄

二

办书院,一是要有好的办学理念,二是要有名师和杰出学生。

1886年书院竣工,主事人延请在南京讲学的著名学者阎镇珩担任首任院长,阎是邻县石门人,曾任湖北荆州教谕加国子监学正銜,其《六典通考》二百卷列入《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之前茅,并远播东瀛。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熊希龄,本土名儒田金楠、吴恭亨等亦相继主讲于此,四方子弟趋趋就就,一时风靡溇澧。

以1905年为界,科举制度废除之前以传统理学为主。之后以新学为主,易名渔浦高等小学堂,书院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班,另设成人养成所,课程有国文、英文、历史、地理、物理、音乐、体育等。“新学禅欧美,深山生龙蛇”“壹志从先贤大家之文,留心时事经济”,转型之快为沅、澧流域之最。

正值风云激荡的年代,维新变法和民主革命思想在此交汇与碰撞。书院正殿对联,出自两度主讲书院的湖湘楹联名家吴恭亨之手:“今日小学堂,愿诸努力;他年新人物,从此诞生”,横批为“茹溪撷秀”。这里的“新人物”,应指“清末新政”“维新运动”之“新”,“辛亥革命”之“新”,迨至尔后的“新民主主义”之“新”。在博学包容、与时俱进的办学理念影响下,渔浦书院英才辈出,成就了“渔浦学子革命前贤居多”的几拨“新人物”人才群体和璀璨气象。

先说维新变法时期。1897年,湖南巡抚陈宝箴创办长沙时务学堂,是中国最早一批建立的新式学校,熊希龄为提调(校长),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谭嗣同、唐才常等为教员。是年秋,来自渔浦书院的李炳寰、田邦璇一同考入第一期,李炳寰为全省第一名(第二名是邵阳的蔡锷)。百日维新失败后,时务学堂停办,两人追随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熊希龄、唐才常留学东瀛。1900年,在梁启超、康有为支持下,两人随同唐才常回国筹划自立军起义,旨在“北上勤王”救出被囚禁的光绪皇帝,以继续推行维新救国。

渔浦书院学子吴良愧由慈利县保送投考长沙求实学堂(即原时务学堂),在李炳寰影响下,亦欣然加入自立会。是年7月,以武昌为大本营的自立军起义事泄,唐才常、林圭、李炳寰、田邦璇等核心成员英勇就义;吴良愧其时受命赴湘西发展会员,不在抓捕现场而

幸免于难,仍不改初衷,组织“七人团”谋杀清廷大员铁良未遂后东渡日本,结识宋教仁、黄兴、孙中山,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工作。自立军起义是通过武装暴力走君主立宪道路的一次尝试,史学界称之为“辛亥革命的一次预演”,渔浦学子在这一震惊朝野的历史事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再说辛亥革命时期。李执中、王正雅少年时就就读于山长阎镇珩门下。李执中1902年中举入仕,1906年加入兴中会,1911年策划并促成王正雅策应武昌起义;1916年受命成功劝说蔡巨猷、唐荣阳、陈渠珍等地方“诸侯”接受孙中山领导,孙中山盛赞“李先生一人可抵千军”。王正雅在云南期间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台,后任贵州按察使,回湘后曾任中将旅长兼常德镇守使;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他会同宜昌军司令、慈利老乡唐牺支围攻荆州,重创清军,孙中山评价其“骁勇善战,有勇有谋”。杜心五,同盟会元老,自然门宗师,被誉为中华的“南北大侠”。1900年赴日本留学,为粉碎清政府陆续派出的暗杀团阴谋,保卫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领袖人物和同盟会开展活动屡立功勋;1937年出任全国抗日群众运动委员会主任;1949年聘为中南军政委员会顾问、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

再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渔浦学子中一些佼佼者,成年后大多分化成国共两大阵营。慈利县党校高级讲师朱立池,对渔浦书院的前世今生颇多研究。他历数腥风血雨年代,共产主义阵营的渔浦学子生死攸关时刻,数番得国民党阵营的渔浦学子出手相助而化险为夷,同窗情谊呵护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他们中共主义阵营的有:袁任远,1926年奉命创建中共慈利县委,1934年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纪委副书记;张一鸣,1928年任中共湘西前委常委、红四军第一师党代表;余惠,1929年参与组织发动百色起义,任红七军前委委员、政治部秘书长;于兆龙,1926年被党组织选送到苏联学习,回国后在湘鄂赣苏区任红十六军政委。红军时期皆是与贺龙、萧克、王震、邓小平、张云逸等共事的高级指挥员。张沈川,1926年在分管特科工作的周恩来安排下,参与筹建中共第一部电台,成为中共无线电通信创始人之一。

国民党阵营的王育瑛,历任国民革命军第43军第5师师长、第198师师长、第54军副军长兼代理军长,1939年率部远征缅甸抗日;朱沛然,国民革命军第5师师长;王育根,抗战期间与美国飞虎队联手鏖战蓝天,后授空军少将衔。另有潜心“教育救国”者如李均声、向名卓,二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在武昌创办江汉大学(武汉大学前身),李任校长,向任教务长,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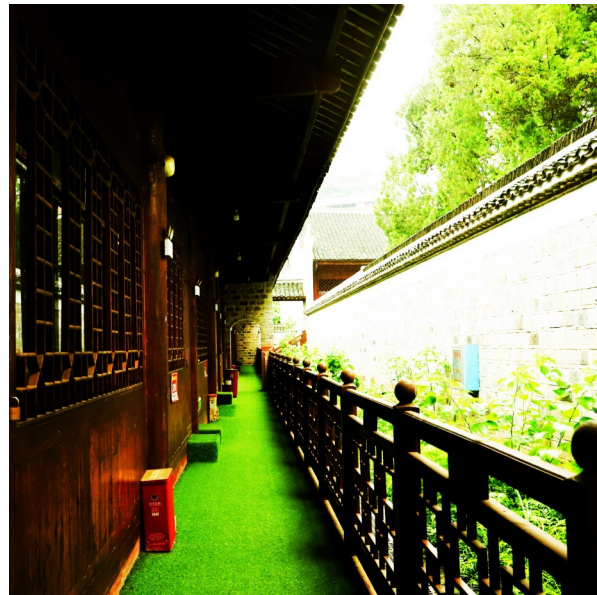
“他年新人物,从此诞生”。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他们或是挺立时代最前沿,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弄潮儿;或是某个时期某个领域出类拔萃的标志性人物。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渔浦学子。

诞生于穷乡僻壤的渔浦书院,真正唤作书院的时间只有21年,从最初的渔浦书院到今天的渔浦小学,总共也只有137年,不同历史时期涌现的几拨“新人物”群体,却玉成叱咤风云的一个个高光时刻。盘桓于时间之上,真想掘地三尺,探寻深藏在书院内层的文化基因和力量,是怎样不可遏止地孵化出一个乡间书院的文化梦想,成就了一个乡间书院的文化英雄主义……



上图:二殿门联。

下图:长长的教室走廊,长长的隔音墙。



三

渔浦书院占地8000多平方米,系仿照岳麓书院的格局建造。百年庭院古色古香,2019年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凝视苍劲峻拔的四株古柏,我疑心这是当年的山长们,目光深邃,神情坚毅而沉静。屏息之际,似可触摸到历经岁月和风霜淬炼的一颗颗师魂。

大门书有嵌字联:“渔猎群经,导扬百氏;浦云十色,溪月九霄。”其中的“浦”少了右上角的“点”。渔浦村的村主任老廖解释说,当初书写时有意少了这一“点”,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告诫学子学无止境,学然后知不足;二是期待学子中有人考取状元了补上这一“点”。被岁月踩得凹凸不平的石板台阶,呈暗红色,细雨洗濯下湿亮湿亮,映衬得自缝隙长出的萋萋芳草格外新绿。石板啊,芳草啊,还记得起当年在这里传道授业的诸位先贤?可还认得出从这里出发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莘莘学子?

村主任老廖说,他在这里念的小学和初中。东西二斋为教室,由两堵矮墙隔开,隔音效果出奇地好,东边的教室自习,完全听不到西边教室朗读的声音。老廖为我们指认老式青砖上铸有“渔浦书院造”的字样;指认当年仿照岳麓书院——在头门墙体上书写的“忠孝廉节”四个大字,惜乎墙体维修,斗大的字只剩下半截了。学校放暑假了。穿行在长长的教室走廊,耳畔依稀响起当年的校歌:“澧水东去,山水秀野背太华。敦其博,矢期显扬。唯渔浦,是吾母校,人才辈出,家国辉煌。续努力,一致奋发图强。任重道远,岂容彷徨!绮袂秀哉,祝渔浦,千秋万岁无疆!”登上八角楼,俯瞰书院全景,老廖欣然相告:近年间村中一男一女考上清华和北大,都是在这里念的小学,渔浦学子后继有人!

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遍及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目前落地湖南的唯一一处是慈利县。慈利县工作站选址渔浦,看中的是书院的文脉。2021年入驻渔浦书院以来,已有8所高校50余人次的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取得了非遗文创、公共品牌设计、美丽屋场设计、非遗美育、产品设计等阶段性成果。工作站的宗旨是围绕乡村发展、人才培养、文化传承、人居环境和组织建设五个方面,助力擘画乡村发展新篇章。以传薪道而济斯民,不啻渔浦书院与时俱进之办学理念在新时代的有力呼应和崭新呈现。

书院是人文精神的道场,书院承载薪火相传的文化梦想。回望渔浦书院,回望19到20世纪从这里走出的几拨“新人物”人才群体,令风云失色的幢幢身影和音容笑貌如同电影慢镜头,于眼前于天幕次第呈现。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渔浦书院恰是将从这里诞生的几拨“新人物”群体浇铸成型的第一轮窑火。

雨后复斜阳,山家阵阵霞。告别渔浦书院,走在阡陌间的村路上,一畦芝麻开着好看的花,让人联想起“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寓意和愿景。江堤所著《书院中国》中的一段话浮上脑际:“他们对书院的忠诚,使事物摆脱了束缚,出现了光明,并最终将书院引入到了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正确的轨道。犹如一个热爱秋天的人,目送书院像行雁那样从历史的天空飞过。”

郭添奇

“涪江桥上好风光,但愿人人陈盛芳。八十万人皆好善,匹夫有责负兴亡。”

漫步在醴陵涪江桥畔,会觉得这样一个现象:在史册典籍中,康有为的名声远大于陈盛芳。然而在醴陵,陈盛芳之名却明显超过了康有为。

陈盛芳(1875-1946),字茂兰,本地富绅贤达。陈盛芳自幼家贫,16岁时师从伯兄学木工,技艺日精。经人举荐去江西萍乡安源煤矿从事工程建筑,因成功建造当地无人能建的超高烟囱而深得矿办及德籍工程师赖伦赏识,矿方遂将多项工程交予他承建,由是名声日隆。后湖南省内的很多大型建筑工程也由他承建,如南岳庙宇、登山游道等。陈盛芳致富后不忘桑梓,捐出巨资倡修涪江桥创办醴陵电气公司、盛芳小学和醴陵县私立东方中学(今醴陵四中)。

1925年10月初秋,时值涪江新桥竣工通车,桥畔早已堆满了人山人海。桥董会一干耆老高兴之余,却在为谁题匾写桥名而犯着愁。适逢省长署秘书傅湘回醴公干,透露了康有为近日即将来湘考察演讲的消息。耆老们顿时欣喜万分,商议着由陈盛芳带队赶赴长沙火车站,一同“拦驾”,请求见面“康圣人”。“康圣人”了解到盛芳的来意,知道他是故交文俊铎的义子后,感叹布衣善士之胸怀。陈盛芳将他请到长沙醴陵馆,康有为大笔一挥,题了“涪江桥”三个大字……

“康圣人”提笔写的“涪江桥”,便为当时之醴陵人庄严而隆重地镌刻在涪江桥上。百年过后,康有为的题字依然镌刻在桥上,这三个字与涪江桥合为了一体。新建的盛芳亭也巍然挺立在桥畔,为往来之人提供着歇息的方便。

为什么是盛芳亭,而不是有为亭?在此是确凿无疑的,在时间的筛选、沉淀过后,涪江桥畔的人们更偏向于“真金白银”后面的善。这份善,深藏大义,更为人们所珍视。

可以确定,善是自发自为的。在醴陵城中,涪江桥应该是五座跨江桥中最朴茂、最有情怀的一座了。早在南宋孝宗乾道年间首次建造涪水桥,那时还是用的木墩和木梁。大概六七十年后的理宗宝祐年间,在状元洲下约20丈处建起了石墩木梁桥,且改名为涪江桥。此后历经元、明、清、民国等,总共毁于火、圯于水者20多次,重修、补修20多次。1918年(民国七年)北军纵火烧毁后,陈盛芳于1924年首倡修桥,他个人捐银3.4万,田租250石,连同政府拨款、桥会资金、私人认捐等共计20多万银元,将涪江桥修缮一新。

涪江桥是一座民桥。陈盛芳不仅修桥,而且护桥。

第一次护桥,是在1926年6月。当时连降大雨,河水猛涨,东门水深1.3米,县城倒塌房屋900多栋……涪江新石桥也因此迎来第一次重大考验。陈盛芳坚信新桥的质量过得硬,他整天都立在桥上,直面凶猛的洪水,对来劝他回去的人毅然说道:“我陈盛芳要与大桥共存亡,桥若垮,死了算!”结果几天后洪水开始退去,大桥丝毫无损。

第二次护桥,是在1944年的夏天。当时日军正准备攻入醴陵,国民党军方面作出了炸桥断路的决定,涪江桥也在其列。陈盛芳听到消息后愤慨万分,决心独闯58军军部,出门前他说道:“涪江桥就是我的命!一县人的心血建造,多么不容易,现在日本鬼子还没来,就要自己炸毁它,我能对得起谁!你们莫拦我,有什么三次八难,也是死了算!”陈盛芳见到58军军长鲁道源后毫无怯意,他说:“我虽老迈小民,却也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只要炸桥能阻挡日军,我无二话。你一声令下,桥我亲自炸,大不了以后再修!”说得鲁道源羞惭不已。他心里十分清楚,黄河都炸了,挡住日军了吗?在陈盛芳的奔走努力下,涪江桥再一次得以保存……

陈盛芳乃文俊铎义子,文俊铎是醴陵瓷业先驱,同时也是大善人。文俊铎何尝不是慧眼识英的伯乐?陈盛芳之善何尝不是受了其父义的影响?这种善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因为这种善,还有着大义大爱的成分,是赤子在回馈一方水土和一方人民。这种善穿越了历史,为后人所铭记。

在千年历史长流中,一直延续着一种义善精神。自建桥伊始,历朝历代像陈盛芳这样的醴陵邑绅,至少自发修桥护桥10多次。《纪善录》这样的书册,就记录了他们的义善事迹。八百余年来,是一代代善的财力、善的心意的接力,让平实而厚重的涪江桥始终屹立在涪江上。

我想,善不是发明,而是笃行。如今涪江桥依然横跨“一江两岸”,为涪江畔的千家万户提供着方便。桥畔的盛芳亭依然挺立,它肯定是在等候更多的“陈盛芳”出现……



涪江桥。

肖邦魁 摄

百年风雨涪江桥